

《日下旧闻考》一书的编 刻时间及其历史价值

吴元真

《日下旧闻考》一书原名《钦定日下旧闻考》，简称《旧闻考》。这部书是清高宗弘历命于敏中、英廉等人在朱彝尊编纂的《日下旧闻》一书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考订、增补而成，全书凡一百六十卷。这部由清政府官修的北京地方史料巨著，在现存的北京地方文献史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史料价值也愈来愈得到更多的北京史学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本文就该书的编纂缘起及初刻时间和它的历史价值做一浅述。

一、《旧闻考》一书的编纂缘起

《旧闻考》一书的编纂，客观上是对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的修订和补充。朱氏从一千六百余种史籍中，将有关北京地方的历史、地理、城市、衙署、风俗、名胜等史料摘录、整理并加以考订汇辑成书，初刻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姜宸英在序中称：“则所谓详核典瞻者矣，又间以己意，辩论其是非，援据精确，辞雅义畅，前未有此书也。”^① 给予极高的评价。

《日下旧闻》一书问世后，经过清初康、雍盛世，到乾隆高宗时，弘历为什么再命馆臣重加订证编纂呢？在《旧闻考》成书之后，乾隆帝题词二首，冠于卷端，对此有所表白。

重考彝尊书以成， 七言权当序而行。
名因日下荀文若， 迹逮春明孙北平。
挂漏岂无补所阙？ 淆讹时有校从精。
百年熙皞繁文物， 似胜三都及两京。

曾赋皇都与帝都， 若兹形胜古今无。
金迁元复其久矣， 明筑清修滋盛乎。
御苑法宫诚富此， 返淳还朴益殷吾。
论成知过渊衷写， 更励聪听奕叶图。②

诗的注文中说：“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据拾载籍及金石遗文，分为十三门四十二卷，颇为综核，与北平孙承泽所著《春明梦馀录》七十卷，均有裨于帝都考证，但其书不免挂漏淆讹，因命馆臣重加订正。”③又说：“朱彝尊书成于康熙二十七年，今又及百年，太平熙皞，民物繁昌。自宫殿城市改置添建。复编增为十五门，成书一百六十卷，名曰《日下旧闻考》。”④由此可以看出，编纂《旧闻考》一书的缘起。如果再读一下乾隆帝为编纂《旧闻考》一书所写的谕文，就会进一步清楚弘历编纂该书的真正目的。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甲辰。弘历的谕文曰：“本朝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博采史乘，旁及稗官杂说，荟萃而成。视《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览志》诸编，较为该备，数典者多资之。第其书详于考古，而略于核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非所以示传信也。朕久欲详加考证，别为定本，方今汇辑四库全书，典籍大备，订讹衷是之作，正当其时。京畿为顺天府所隶而九门内外，并辖于步军统领衙门。按籍访咨，无难得实。著福隆安、英廉、蒋赐棨、刘纯炜，选派所属人员，将朱彝尊原书所载各条，逐一确核。凡方隅不符，记载失实，及承袭讹舛，遗漏未登者，悉行分类胪载。编为日下旧闻考，并著于敏中总其成，每

辑一门，以次进呈。候朕亲加鉴定，使天下万世，知皇都闾丽，信而有徵，用以广见闻而供研炼。书成后，并即录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其如何厘定章程，发凡起例之处，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议以闻。”^⑤

从这篇谕旨，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乾隆皇帝很早就产生了要修订《日下旧闻》一书的想法。为了修订此书，弘历确实也做了些准备。例如早在二十七年前乾隆十年（1745），他就曾命工部左侍郎励宗万对京城内的古迹进行调查。励宗万是当时有名气的文人，受其敕命，依据《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畿辅通志》、《天府广记》、《水经注》、《通志》、《金史》、《缙山集》和《万历野获编》等文献史籍，对京城内东岳庙等四十六处名胜古迹进行考查。经过“案古证今、循名核实”^⑤之后，于这年冬十月写成《京城古迹考》一书，“恭呈御览，以备圣明采择焉。”^⑥

第二，为编修《四库全书》，乾隆帝下诏全国，广求天下遗书。一时全国各地官、私所藏善本珍籍，纷纷被采纳进京。这就使朱彝尊在编纂《日下旧闻》时未能见到的记述北京的重要典籍涌出，为编纂《旧闻考》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

第三，在论文中弘历讲明了他敕命编纂《旧闻考》的目的，是让天下万世都知道大清朝国都之闾丽，多少年后仍有据可查。所以他命书成之后，收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乾隆皇帝就是要通过编纂《旧闻考》这部书，来颂扬大清朝圣祖玄烨、世宗胤禛和他本人对北京城内外大兴土木的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

编纂《旧闻考》一书，是清高宗弘历多年的宿愿，所以要“钦定”此书也是为了要达到他歌颂清初盛世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书缘起”一诗来分析他编纂《旧闻考》一书的缘因，还要看到当时的有利条件和弘历的主观愿望。

《旧闻考》的成书年代，依据弘历论文中所说：“书成后，并即录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⑦的说法，应以该书被录入四库全书的时间作为它的成书时间。据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旧闻考》记载英廉等人将书稿一百六十卷目录一卷随表恭进给弘历帝的时间，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年二月初五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弘历亲定全书后，再经总纂官纪昀、陆钧熊、孙士毅等人的校阅无误后，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恭校上，收入《四库全书》成为定本。

《旧闻考》一书的初刻时间，其说不一。

（一）无确切的刊刻时间。《书目答问》和《清史稿·艺文志》，只注“乾隆三十九年敕撰”，^⑧没注成书和初刻时间。周家楣、缪荃孙等人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艺文》中载：“《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存，乾隆□年刊本。”^⑨这里虽有乾隆年号，但无具体纪年。

（二）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此说见于陶湘的《清代殿版书目》。该书记：“《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清高宗有序，于敏中等奉敕纂，乾隆四十三年刻。”（清代殿版书目）

（三）初刻时间应不早于乾隆五十年（1785）。此说，见于198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标点本《旧闻考》的出版说明：“这本书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辑，书中有乾隆五十年的诗，出书应不早于乾隆五十年。”^⑩又见198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编写的《北京历史纪年》一书，也认为：“1785年，乙巳，清乾隆五十年，是岁，《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刻成。”^⑪

今据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和五十二年三月丙子，清高宗弘历关于修葺明陵和保护明陵的两篇论文，以及乾隆皇上的御制《过清河望明陵诸体诗》，在内府刻本《旧闻考》的初印本和后印本中均都收入。所以，应得出结论《旧闻考》一书的初印本即内府

刻本的刊刻时间，应不早于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八日更为准确。

二、《旧闻考》一书的历史价值

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集一时之俊，凡四十余人，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编纂，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旧闻考》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

《旧闻考》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承袭《日下旧闻》原有体例，由于内容上有大量的增补和编纂者极力贯彻弘历论文的旨意，突出宣扬大清朝皇帝的功德业绩。故在原门目次序上和个别门目中的内容及时间顺序上进行了调整。并新增“官署”、“国朝苑囿”二门，使之成为十五门。即卷一星土，卷二至卷四世纪，卷五至卷八形胜，卷九至卷三十六国朝宫室、宫室（辽金、元、明），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一京城总纪、皇城、城市，卷六十二至卷七十三官署，卷七十四至卷八十七国朝苑囿，卷八十八至卷一百七郊垌，卷一百八至卷一百四十四京畿、侨治、京畿附编，卷一百四十五户版，卷一百四十六至卷一百四十八风俗，卷一百四十九至卷一百五十一物产，卷一百五十二至卷一百五十四边障，卷一百五十五至卷一百五十六存疑，卷一百五十七至卷一百六十杂缀，卷末列译语总目，用资考证。文字达到一百六十余万字，是元、明以来空前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集成。

《旧闻考》一书，对朱氏《日下旧闻》原书文字援古证今详为考核。对原本所列古迹，皆一一履勘遗踪，订妄以存真，阙疑以传信。对原书所引艺文，或益其所未备，或删其所可省，务使有关考证不漏不支。纪昀、陆锡熊等人认为，《旧闻考》与原书相比“为之正讹补漏，又驾彝尊原本而上之，千古与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⑫

《旧闻考》一书的历史价值，首先表现在汇辑的史料极为丰富。它是继《日下旧闻》之后，汇辑北京地方历史、地理、城

市、坊巷、宫殿、衙署、名胜、古迹等史料最为宏富的北京史地专书。编纂者除借四库馆开之便，蒐集了更多的珍藏史籍之外，还大量地采用了政府官署中的案卷档册。如礼部册、吏部册、工部册、户部册、刑部册、兵部册、六科册、翰林院册、都察院册、宗人府册、国子监册、钦天监册、太医院册、南苑册、清漪园册、畅春园册、静明园册、圆明园册、西花园册、内务府册、銮仪卫册、健锐营册、旗册、火器营册、圣化寺册、普济堂册、泉宗庙册、城册、州册、顺天府册、五城寺院册等。这些档册都是清朝各级官府的文书档案，一直被禁锢于清廷内府或各官府衙门内。在这些案卷档册之中，保存了大量的元、明时代的古碑残碣和刻石题字，以及乾隆时期北京地区所属官署、苑囿、寺院、古迹等的兴废变迁和现存情况的记录。例如：清初对西山脚下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的修建，可以说是康、雍、乾三朝盛世对京西万寿山、香山、玉泉山开发利用的代表作。该书在国朝苑囿中记述这些皇家苑林，直接利用了这些园林的档册，故对每座园林的兴修始末，记载颇为详尽。这对我们今日研究这些皇家园林的历史沿革、建筑艺术以及对这些古代建筑的保护都提供了最翔实的史料。

其次，在《旧闻考》成书以前纪述北京地方史地专书，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或专记景物、山川、风俗、古迹等事。从《旧闻考》开始由分散的个人游记式的纪述北京名物古迹、掌故传闻的专书，走上由政府组织专门机构，集众人之智慧去研究纪述北京历史和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道路。由于《旧闻考》是奉敕官修的一部北京史地专书，乾隆帝钦点于敏中董其事任其总裁，后又有英廉、和珅、梁国治、德保、刘墉、钱汝诚六人加入总裁。这些人与该书督办福隆安，总纂窦光鼐、朱筠等，都是乾隆手下的一批既有权势又有学识的儒臣，对朱氏原书文字，逐条详加考核，并实地踏察订证，对难以酌定者列入存疑卷中，不妄加评论。书

中按语大多中肯可信，不仅文字准确而且也有一定的深度。例如：卷四十三丽正门条下，按语指出了原书所引《北平古今记》所记“洪熙元年，正阳门名始见于实录。”^⑬的说法有误。又如，在卷五十四中纠正了原书所引《燕都游览志》所记“德胜门城上，镌赵子昂书德胜门三字。”臣等谨按中说：“今德胜门即《元史·地里志》所载健德门也。《辍耕录》亦作健德，明永乐间尚存其旧。至正统十年，以旧城内面用土恐易颓毁，命成国公朱勇等甃之，始改名德胜。赵子昂乃元初人，安能预书德胜门字也？朱彝尊原书所引燕都游览志误矣。今各城门额俱清汉书。”^⑭这段按语不仅文字简洁而且也非常有力。再如：在边障门卷首臣等谨按中言道：“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明初徐达筑边墙，自山海关西抵慕田峪一千七百余里，阨塞又安足恃乎？”^⑮这一问颇有道理，寓意深远。

再就是，全书收集了近两千种书籍和史料，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些古籍已经散失，如熊自德《析津志》、明洪武《北平图经志》、孙国枚《燕都游览志》、周萑《析津日记》等书，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已残缺不全。书中还辑录了大量的古碑残碣和一些刻石题字。如《唐悯忠寺苏灵芝行书宝塔颂碑》、《宋宣和七年燕山府清胜寺故讲经律论提点慈慧大师实德记》、《辽驻蹕寺沙门奉航幢记》、《元赵垚延东岳庙昭德殿碑》等。这些可以与文献互相印证的碑刻，都是研究北京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但这些刻石有的已遗失不存，有的因年长日久字迹已漫漶不清，其原刻文字内容也都全赖此书保留了下来。所以，《旧闻考》一书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一批早已湮没的珍贵史料，为今日北京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旧闻考》一书不足之处，在于它纪述的内容偏重于皇宫苑囿，其文字繁冗而不厌其多。然对众多的民间文化遗存却略而不书。尤其是书中收录玄烨、胤禛、弘历三帝的大量御制诗文，虽

其中有些记事、咏物之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一些乏味之作，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旧闻考》在乾隆五十二年雕板刊行之后，次年就有吴长元据《日下旧闻》和《旧闻考》两书再行爬梳删节去芜存菁，并对两书记载疏略未尽之处加以补充，错误不实之处加以纠正。写出《宸垣识略》一书，凡十六卷。

应该指出，该书的编纂缘起，就是以宣扬大清朝初期太平盛世的皇都雄伟壮丽“似胜三都及两京”，以达到歌颂和维护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所以书中有不少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词和宣传封建迷信色彩的文字。

注：

①《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六十第257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铅印标点本）

②③④《日下旧闻考》御制题词第1页（版本同注1）

⑤⑥《京城古迹考》第2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铅印标点本）

⑦《清实录》卷九百三十七第607～608页。

⑧《书目答问补正》卷二第145页。范希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铅印标点本）《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第4288页。（中华书局铅印标点本）

⑨《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一第636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铅印标点本）

⑩《日下旧闻考》出版说明第6页。

⑪《北京历史纪年》第222页。（北京出版社）

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二百五十五第497册第23页。

⑬《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第671页。（版本同注1）

⑭《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第384页。（版本同注1）

⑮《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二第2429页。（版本同注1）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